

社会抗争与政治参与的交融

——理解中国公民行动的一个新视角

戴 犇 利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公民行动两种主要研究路径具有局限性,应正确认识当下中国公民行动具有社会抗争和政治参与相互交融的特征。“抗争—参与”是理解中国公民行动的新的解释框架。这一新框架统摄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这两种具体的公民行动模式。两个典型案例展示了“抗争—参与”行动的因果机制和运作机制,由此主张促使社会抗争与政治参与进一步交融,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全面提升公民行动水平。

【关 键 词】社会抗争 政治参与 抗争性参与 参与式抗争 公民行动

【作者简介】戴犇利(1981—),男,广东梅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3-08-30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4)01-0096-08

一、问题提出:

公民行动两种研究路径的局限性

所谓公民行动,是指公民基于同政治权力的契约关系,向政府或者与政府相关的第三方表达诉求、争取权益,进而参与、影响公共事务决策的行为。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参与意愿不断增强,公民行动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学界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和研究,产生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成果,很好地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纵观现有研究,其主要的切入路径有二:一是将公民行动视为政治参与的一种类型,借用政治参与的解释框架加以阐释;二是强调社会与国家的相互制约关系,将公民行动视为制约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突出公民行动与政治权力之间的“抗衡性”,主要借用社会抗争的相关理论加以解读。应该说,这两种研究路径,对于当下中国公民行动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解释力,但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从政治参与切入的研究路径非常强调公民行动的主体身份(谁行动?),将是否具备行动资源和能力作为影响公民行动的核心变量,存在明显的精英决定论倾向。其认为,中国当下的公民行动主要

是由一部分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少数权力精英引领的“权利启蒙运动”,这些精英的主体性条件是公民行动的解释起点和重点。如在著名的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事件中,很多研究认为,以厦门大学教授和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代表的精英群体的介入决定了事件理性协商、谈判对话的总基调,是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知识水平、斗争策略赢得了政府的重视和促使政府保持克制,并最终改变决策。^①这种研究路径看到了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较为有限,只有小部分人能够通过法定渠道接触政治权力并对其施加影响的现实,但却没有意识到,恰恰是由于制度化参与渠道的不通畅,精英群体在公民行动中的角色地位是需要审慎对待的。而且其同时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与成熟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制度化、常态化“政治参与”相比,中国精英群体参与公民行动的起因更多是因情景刺激而起的抗争行动,其行动逻辑在“参与输入—政策输出”的政治参与动力学分析框架中难以得到充分解释。

从社会抗争切入的研究路径十分关注公民行动的表现形式(如何行动?)。其认为,在中国公民

^① 曾繁旭、蒋志高《厦门市民与PX的PK战》,载《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期。

社会整体发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公民行动更多是在权利底线遭受权力压迫时的一种情境性应对,具有强烈的抗争色彩,而社会底层由于权利保护能力的欠缺,往往更容易成为抗争行动的主体。这与政治参与研究路径强调精英的角色作用形成鲜明对比。近年来,由于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矛盾增多,借助互联网等新型平台,草根民众的社会抗争逐渐走到了公民行动的前台,使从底层视角出发的公民行动研究获得了话语主导权。于建嵘教授更是直言“在我的理解中,抗争性政治是一种底层的社会行动,因此,离开底层的解读是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的。”^①同时,国外抗争性政治理论被大量引入,中国公民行动研究大有等同于公民抗争行动研究之势。这在有力弥补传统政治学“底层无政治”理论缺陷的同时,也带来了用底层社会的“生存政治”来统摄民主社会的“权利政治”的问题,使对公民行动的解读囿于“刺激—反抗”的因果机制,未能充分考虑在执政党坚持依靠普通大众作为其合法性来源的情况下,政治权利空间存在不断扩大的可能,对将社会抗争引导到政治参与方面未能显示出应有的建设性。

基于对上述两种路径的反思,我们意识到,转型时期的中国公民行动具有典型的混合特征:一方面,它确实是一部分成熟起来的精英群体试图突破传统政治壁垒的努力,但他们的行动离“标准的”政治参与尚有较大差距,常常表现出突破法定政治参与渠道和方式的趋势,带有明显的社会抗争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执政党鲜明的依靠普通大众的意识形态主张和公民权利观念的普及,普通公民在合法性旗帜下对政治权力施压,用社会抗争的方式不断拓展制度化影响公共决策的空间。这种抗争方式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亨廷顿所讲的政治现代化带来政治参与需求急剧增长的问题,也创造了由非制度化抗争向制度化参与转变的现实路径。可见,现有的两种研究路径存在选择性偏执的问题,难以对中国公民行动的复杂面相做出客观的全景式描绘。基于此,我们试图对现有两种研究路径和方法进行理论整合,打破两种研究路径各执一端、孤立地引用政治参与和社会抗争理论加以比附式解释的做法,从一个更为客观的立场出发,重新思考公民行动在当下中国政治行动结构图谱中的位置,提出更为切合中国公民行动实际的新理论。因此,本文尝试将政治参与和抗争政治勾连起来,提出“抗争—参与”这一理解中国公民行动新的解释框架。

二、理论建构:

基于对两个典型案例的辩证解释

(一) 案例引入

正在发生的丰富现实是所有理论的先导,中国转型期公民行动呈现的多元面相是各种理论框架得以建立、对话、辩驳的基础。本文通过引入两个典型案例,进一步审视现有研究框架存在的不足,证成新的解释框架建立的必要性、合理性。

案例一:教育公平联合行动

2011年10月24日,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著名法学专家郭道晖等在内的15名学者及社会人士,联名向国务院递交“关于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建议”,呼吁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考生户籍限制,这让一直备受关注的教育公平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此前的2010年2月,部分非北京户籍家长为争取孩子在居住地参加中高考的权利,率先发起了“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力求推动“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还随迁子女在常居住地教育公平的权利”。随后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家长也纷纷加入到此行动中来。各地家长采取的主要行动包括,每月由家长志愿者去教育部、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递交呼吁书,表达利益诉求;建立“我要高考”等专门网站和15个以居住区域划分的QQ群,通过网络扩大影响、争取舆论支持并协调行动;超过2000名志愿者在各地街头、地铁、商铺等公共场所,宣传其价值主张,征集支持签名,截至2011年底,征集支持签名超过50000个;联合法律专家学者,撰写《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并提出《以居住地和学籍确定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建议方案》等具体政策建议。特别是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家长们通过向数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寄送呼吁书及万人签名册、向教育部长发公开信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公众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度,并促使教育部领导做出“随迁子女如何参加高考很快将出方案,目前正在加强调研”的表态。但由于随迁子女高考问题涉及户籍考生的切身利益,各地在此问题上进展缓慢,问题的全面解决仍然遥遥无期,而各地家长的抗争行动也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少数户籍考生家长由于担心自身利益受损,也采取向教委

^①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第13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递交公开信、集体上访等方式,明确表示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围绕教育公平问题,不同群体的博弈不断深化。2012年9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在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截至2013年4月,北京、上海、广东等重点地区相继出台了异地高考方案,为全面实现异地高考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从现有方案来看,各地依然为非户籍考生参加异地高考设置了诸多限制条件。可预见,非户籍考生和家长为争取教育公平的公民行动仍难以全面平息。^①

这一案例初步显现了“抗争—参与”公民行动的特点:一方面,非户籍公民认为自己的受教育权利被部分剥夺,对此他们用行动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不满和反抗,希望通过集体的抗争获得舆论支持,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他们更希望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正式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并努力争取具有更多政治参与资源的专家学者等群体的支持。在行动过程中,他们非常强调其行动的合法性,例如援引《教育法》关于“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的相关规定来证明其行动的法理依据,他们并不愿意被视为规则的破坏者,在抗争手段上持保守态度,具有明显的政治参与色彩,是一种“抗争性参与”。

案例二:刑辩律师维权行动

2009年11月14日凌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黄焕海等三个年轻人在酒后与来自广西钦州的青年裴金德发生口角,黄焕海遭到裴金德一帮钦州老乡的群殴。检方事后指控裴金德、裴贵、杨炳棋和黄子贵等四人犯故意伤害罪,指控他们殴打致死被害人黄焕海并抛尸大海。北海当地律师罗思方、梁武诚、杨在新、杨忠汉等四人分别为四名被告担任代理律师。2010年9月26日,该案一审开庭,四律师对检方证据进行了质疑,认为四名被告从作案时间上不存在检方起诉书所称的在群殴后打出租车将黄焕海拉至码头继续殴打致其死亡,然后抛尸大海的可能。法院传唤的三名目击证人宋启玲、杨炳燕和潘凤和的证言也倾向于被告无后续作案时间。四名被告在庭上当庭翻供,庭审被迫中止。2011年1月28日,北海市检察院书面建议北海市公安局尽快将涉嫌故意伤害罪的另一同案犯裴日红抓捕归案,同时传唤涉嫌包庇罪的三名女证人宋启玲、杨炳燕和潘凤和。北海市公安局分别于2月2日和3月7日,将宋启玲和潘凤和传唤到案,并随即对两人实施刑事拘留。6月14日,四名被告代理律师被

北海司法机关以涉嫌伪证罪为由刑拘。令人意想不到的,四名代理律师被刑拘迅速引来了法律人士,特别是律师群体的极大关注。很多知名法律工作者通过微博、论坛等网络渠道转发、评论事件最新进展,公开表达对律师执业环境恶化的担忧,对法外因素干扰司法实践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国内一些知名刑辩律师通过网络号召成立律师团为北海同行提供援助,由此网上的围观转变成了线下的行动。6月26日,陈光武、李金星、朱明勇、张凯、王兴、杨名跨等6位律师组成的“北海伪证案律师团”飞赴北海,为4名律师提供法律帮助,随后又有全国人大代表、知名律师迟夙生等人加入其中。律师团在北海维权过程中遭遇了包括原告家属围攻、会面被告遭严苛安检等情况,这使这次罕见的律师集体维权行动进一步得到舆论关注,而讨论的焦点也从北海律师案本身延展到刑事案件被告人权利保护、律师权利维护、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国法治建设路径等更为宏观的议题上。人民网、《南方周末》等权威媒体多次深入报道事件进展。一时之间,如何改变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之间的不对等地位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全国律师协会也于6月28日发表公开声明,对北海警方抓捕律师24小时内不知会律协、48小时内不安排会见等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并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协向北海警方跟进交涉。2012年两会期间,律师团成员迟夙生等全国人大代表结合其北海维权经历,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要求从法律层面改善律师从业环境。律师团的介入

① 张千帆《异地高考方案应让公众参与,不应关门立法》,人民网教育频道,2012-10-16, <http://edu.people.com.cn/BIG5/n/2012/1128/c1053-19727441.html> 《异地高考风声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对户籍问题的关注》,见《羊城晚报》,2012-03-05 《专家称异地高考符合潮流 真正兑现须严密制度设计》,中国新闻网,2012-10-16, <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2/03-07/3725821.shtml> 《异地高考民间方案公布 5万余人签名支持》,人民网,2012-10-16, <http://edu.people.com.cn/GB/16067220.html> 《家长联名到教育部递交异地高考建议》,见《京华时报》,2012-03-25 《异地高考获46%网民支持 京沪95%市民反对》,搜狐教育,2012-10-16, <http://learning.sohu.com/20120906/n352474618.shtml> 《20余名北京籍人士到教委抗议异地高考 称权益受损大》,凤凰网,2012-10-16, http://news.ifeng.com/mainlan/10/19/18384512_0.shtml 《北京:数十名本地、外地家长因异地高考对峙爆冲突》,凤凰网,2012-10-16, http://news.ifeng.com/shendu/nfzm/detail_2012_10/26/18584449_0.shtml 《异地高考,动了谁的利益》,南方周末网,2012-10-16, <http://www.infzm.com/content/72020>。

明显改变了北海案的走向,而2012年3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对律师维权行动进行了一定的回应,如对于律师伪证罪,新法增加了“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的规定等。2013年2月6日,北海律师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律师被解除取保候审,获得自由。更重要的是,北海律师案使被称为“抱团取暖”的律师集体维权模式流行起来。在北海律师案前后,律师团的身影先后出现在常熟、成都、贵阳、重庆、青岛等地,不少专家认为,这开创了律师推动国家法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新模式。^①

这个案例同样属于“抗争—参与”公民行动。由于刑辩律师群体的执业环境长期不如意,北海律师的“遭遇”引起了律师群体的强烈反弹,他们以弱者的姿态出现,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抗争特征。但与此同时,他们的“野心”却是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等制度来彻底扭转律师群体的弱势地位。因此,他们非常注重通过体制内渠道获取支持,如设法让全国律协公开表态、积极影响人大对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的修订等,表现出明确的参与意识和较高明的参与策略。与教育公平联合行动案例相比,这个案例的抗争色彩要更浓一点,但其争取政治参与的努力同样显现无疑,是一次典型的“参与式抗争”行动。

上述两个案例都是典型的公民行动,虽然两个案例在抗争和参与这两者的侧重上不同,但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共同点,那就是政治参与和社会抗争的有机融合,都可以被称为“抗争—参与”式公民行动。此外,两个案例还体现出“精英有抗争,底层有参与”的特点,打破了现有解释框架“底层因无法参与而抗争,上层因参与充分而无需抗争”的归因模式。政治参与和社会抗争有机交融、精英与草根充分互动的生动现实初步证成了“抗争—参与”这一新的解释框架的合理性。简单讲,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包括“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两个理论面向,其核心思想是,在一定条件下,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抗争存在融合的可能性,这种公民行动模式能够为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利益诉求有效表达开拓新的路径和空间。下面,我们围绕该解释框架的两个理论面向作进一步的阐释。

(二) “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

“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是“抗争—参与”解释框架下的两种公民行动模式,同时也是“抗争—参与”解释框架的具体化。

1. 抗争性参与。其意味着公民用抗争的方式表达不满,通过抗争赢得与政府对话的机会,并试图最终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是一种以抗争为手段、参与为目的的公民行动。抗争性参与是对抗争性政治和政治参与交集地带的描述和定义。这里面包含着经验事实判断和价值主张两个层面。于前者,我们认为抗争性参与在形式和内涵上契合于政治参与的核心要义——公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而并不只是一种被动式、情景式反应,它具有明确的政策诉求;于后者,它表明了将抗争政治行为引导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轨道上来的价值主张,而拒绝将抗争政治视为逾越法律界限的不合法行动。那么,这种事实判断和价值主张能否成立呢?

就事实判断来看,当前中国大部分社会抗争在诉求上都指向具体的政策行为,几乎不涉及国家政治层面,即不以反对国家政权为诉求目标。于建嵘认为“在中国盛行的以‘权利’语言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的抗议,往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偶尔成功)。但这些抗议者极少质疑中国共产党或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威……在此情况下,民

① 徐智慧《“北海律师案”博弈》,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30期;刘堃、迟凤生《为律师争取空间》,载《京华周刊》2011年第14期;朝格图《敢言敢为迟凤生——她的行动就是她最好的议案》,见《南方周末》2012-03-15;陈光武《从北海案,谈刑辩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法邦网,2012-10-17,http://lawyer.fabao365.com/99440/article_99440/article_99685;《北海伪证案办案律师遭围攻》,财新网,2012-10-17,http://china.caixin.com/2011-07-19/100281139.html;《全国律协就律师在广西北海办案受阻发表声明》,人民网,2012-10-17,http://legal.people.com.cn/GB/15226225.html;陈有西《北海律师案的<刑法>意义》,共识网,2012-10-17,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fzyj/articles/zgyj/fzyj/article_20120526605.html;陈光武《刑法修改提速,业内透漏与北海案件有关》,陈光武个人网,http://www.chinavalue.net/745762/Default.aspx,2012-10-17;李法志《广西北海律师案——中国律师已开始反攻战》,中国律师网群,2012-10-17,http://wq.zfwlxt.com/blog/blogshow.aspx?user=20087&itemid=49ecd4ae-3712-4935-9433-a09a00b4701e;《北海律师团为谁而战》,新浪网,2012-10-17,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15/13422993051.shtml;《云南律师参与北海律师维权案始末》,春城1网,2012-10-17,http://wb.yunnan.cn/html/2011/renwudili_1107/848.html;《“北海伪证案”:让律师真正成为律师》,凤凰网,2013-03-05,http://news.ifeng.com/opinion/gundong/detail_2013_02/08/22056532_0.shtml。

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是挑战”,而且,“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①因此,很多社会抗争行动在开始时就是指向“参与”的,其与合法的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存在出现交集的充分可能。在案例一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追求教育公平的行动者们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要通过抗争改变现行的高考招生制度。同时,我们又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虽然采取了集体上访、发公开信、散发传单、征集签名等典型的抗争行动,但始终将行为约束在政府可接受的范围内,就是与部分反对放开异地高考的户籍居民同时出现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办公场所时,双方也只是发生了低烈度的对抗。

就价值主张来看,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执政理念,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我们认为,抗争性参与本质上是符合国家和执政党基本主张的,在法理上是能够成立的。

2. 参与式抗争。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参与式抗争和抗争性参与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两者在表现形式上高度重叠。换言之,参与式抗争和抗争性参与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同时被用于对一个公民行动事件的描述,但两种模式在主导面相上各有侧重,抗争性参与更多地反映了行动事件的参与面相,而参与式抗争则突出了行动事件的抗争性特征。由此,我们将参与式抗争作为社会抗争中的一个类型。与其他社会抗争行动相比,参与式抗争最大的特点是,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更具建设性,在抗争手段、抗争程度、抗争指向等方面更具可控性,刑辩律师维权行动案例就具有典型的参与式抗争特征。此案中,在尚无法判断四名代理律师是否真的触犯伪证罪的情况下,律师团成员就决定予以援助,这表明律师团首先表达的是对中国刑事案件长期存在的“律师参与辩护率低、刑事辩护质量低、刑事律师地位低”、刑事辩护律师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维护的司法现状的不满,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抗争

特征。

概言之,从政治参与的角度看,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制度化参与方式:其行动过程可能产生逾越法律范围的行为;其存在于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之间的过渡地带。从社会抗争的角度看,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具有“非典型性抗争”的特点:其抗争的“烈度”在总体上保持在政府可容忍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至于这个“度”的区间则取决于具体的政治情境。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两种公民行动模式突出反映了社会抗争和政治参与有机融合的现实。两种模式得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由于各种原因在平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处于被压抑和扭曲的状态,需要公民通过抗争的方式予以激活。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行为的大量涌现是中国社会力量处在有所发展又发展不足阶段的一个体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普通公民的权利意识在特殊情境下被激发出来,发出其不满却不失理性的声音,以既抗争又合作的方式与政府进行互动并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抗争—参与”行动的机制和过程

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我们需要对“抗争—参与”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社会抗争与政治参与相互融合的因果机制是什么;二是“抗争—参与”事件本身的展开过程和具体机制是什么。

(一) 因果机制

政府是公民行动的主要诉求对象,政府的行为属性直接或间接形塑着公民行动,离开对政权性质的合理把握,对“抗争—参与”公民行动的理解必定是偏颇的。查尔斯·蒂利等人围绕“政治权力以及诸政治机构的结构形式是如何与抗争政治的特征相互作用的”这一核心问题而提出的“政治机遇结构”概念和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为我们探讨特定政治背景下公民行动的产生逻辑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

政治机遇结构主张从政权的开放性、政治结盟的稳定性、挑战者获得支持的有效性、现政权压制反对意见的能力等方面考察政治权力与社会抗争

^①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第4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的关系。^① 由政治机遇结构审视“抗争—参与”行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介于开放与封闭之间的政府体制是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得以成立的重要政治机遇结构。因为,从理论上讲,一个完全开放的政府,抗争行为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公民有充分的渠道影响政府决策;而一个完全封闭的政府,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无可能,抗争则只能采用革命等颠覆性方式。在开放与封闭的区间之内,政府体制越开放,公众参与的机率越高;政府体制越封闭,社会抗争的机率越高,见图1。当一个政府的开放程度恰好处于一个将开未开状态的时候,公民就有可能通过适度抗争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政治参与的机会,从而使社会抗争与政治参与相互交融,形成我们称之为“抗争—参与”的行动模式。案例一中,主张放开异地高考的人士没有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正式渠道,法律赋予的决策建议权、参与权处于虚置的状态,因此,他们只能采取诸如集体请愿、信访、联合签名等抗争方式表达不满,进而赢得一定的话语权,迫使政府对此做出回应,达到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案例二中,权力体制表现出的封闭性更强,因此,行动者抗争的意味也更浓。北海司法机关在律师的“过激”反应面前,尽管不大情愿(如给律师团的维权行动制造一些障碍等),但迫于舆论和法理压力,不得不表现出理性克制,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妥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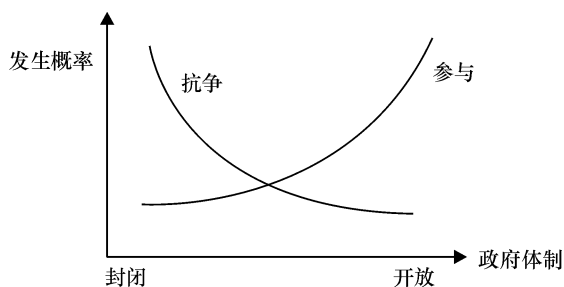


图1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抗争—参与”行动模式形成的因果机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落差,容易引起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当社会流动机会不足时,人们将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来弥补差距,这在政治制度化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将导致政治不稳定。^② 以亨廷顿的理论审视当下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伴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社会潜在的政治参与意愿大幅提高,但由于各种原因,疏导这

种参与意愿的渠道并不通畅,因此,社会抗争(政治不稳定)的风险随之增加。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较高的政治能力,这就促使一方面社会抗争主体自觉控制抗争烈度,另一方面政府在面对抗争时具有较充分的回旋空间。在这样一种博弈格局中,社会抗争与政治参与具备了融合的机会结构,政府控制范围内的抗争性参与或参与式抗争就成为疏导民众参与需求的一种可行方式。

(二) 展开过程及机制

“抗争—参与”的公民行动有着较为清晰的演化路径,能够划分为几个比较典型的阶段,下面我们主要依据上述案例对每个阶段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

1. 初始启动阶段——触发机制

不同于群体性事件中的泄愤事件,公民行动有着清晰的行动指向和明确的利益诉求,因此它的启动不是某种社会心理弥漫下的情绪爆发,而是有着特定的触发机制。对于“抗争—参与”公民行动来说,法定权利被压抑是最重要的触发机制,也就是说,现行制度对公民的某项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这种权利在现实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歪曲,甚至被践踏。这与当下中国政治参与主要是基于某种义务而非权利的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与很多社会抗争指向具体的利益博弈,没有行动的法理依据,容易逾越法律界限不同。当然,权利被压抑只是触发机制的一部分,公民行动的真正启动往往需要一个“被压抑的累积”过程,突破一个“临界点”。在教育公平联合行动案例中,公民的平等教育权利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但这种权利在落实中却因户籍制度而变成了级差式权利,非户籍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被部分压抑。这在城镇化初期,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大部分留守农村的情况下,尚不足以引起大规模的公民行动。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接受基础教育,城乡和地区教育资源差距越来越大,非户籍公民的不公平感越来越强烈,最终触发了他们的公民行动。在刑辩律师维权行动案例中,律师的会面、取证等权利也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这些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落实,而关于伪证罪这样的法规却在实践中经

①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第71-72页,李义中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译,第32-58页,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常被用以钳制律师,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在北海律师被刑拘后终于触发了律师群体的集体行动。

2. 发展深化阶段——动员扩散机制

“抗争—参与”公民行动在启动后,需要迅速地动员起各种资源,并尽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形成对政府的“强大输入性压力”,动员扩散机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来看,动员扩散机制又是通过两种运行方式发挥作用的。

第一,通过阶层联动丰富“抗争—参与”行动的主体构成。不同的阶层都参与到“抗争—参与”行动中,有助于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动员更多的网络资源,提高行动效率。这在两个案例中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教育公平联合行动案例中,专家学者、人大代表、非户籍考生家长、对改革持同情理解的公众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各展所长、持续的合作行动;刑辩律师维权行动案例中,律师群体、法律学者、媒体、网民、被告等也形成了有机关联,推动“抗争—参与”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抗争—参与”行动,一方面,需要形成适当的抗争强度,产生可撬动政府体制开放的“参与输入”;另一方面,又要使抗争的烈度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避免政府动用强硬手段进行压制。有效的阶层联动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一条件:一则“草根阶层”的充分动员能够有效增强政治压力;二则中产、精英阶层的知识、技术优势能够使其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程序性、合法性提出具有专业水准的质疑,并在有些时候能够提出周全的替代方案,倒逼政府回到理性协商的轨道上来。教育公平联合行动案例中,专家学者通过细致、科学的调研,提出了有较强说服力的改革方案,为影响政府决策争取了主动。

第二,通过信息传播努力实现“抗争—参与”行动的向上规模转变。信息传播的渠道、方式、速度、策略等直接影响“抗争—参与”行动的走向和成败。公民之所以要行动,从根本上说,缘于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力量不对称。因此,民众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把自己联结起来,弥补与政府的力量差距,而这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借助信息传播,“抗争—参与”事件能够在短时间内超越初始发生地而在更高层次(如由地方到全国)上发生影响。中国公民行动的直接诉求对象一般为地方政府,较少涉及省级以上政府,这使较高层级的政府能够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出面纾解公民抗争压力,或者施压地方政府增加开放度,从而使“抗争—参与”行动取得成效。案

例一中,由于抗争者们诉求的事项具有普遍性,因此很快使抗争影响超越地方层面,形成了以京、沪、广三地为中心的全国性抗争行动。这最终促使教育部出面表态将督促各地尽快出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扮演了抗争主体与地方政府决策者之间的协调者角色。案例二中,律师们的抗争行动很快引来了全国媒体和法律人士的关注,这远远超出了北海检方的预料;全国律协、广西政法委均公开要求北海检方严格依法保护律师权益,对北海检方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在“抗争—参与”行动中,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互联网是最重要的两种信息传播渠道。前者,有效地增加了信息传播的信度,而后者则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同时,在组织化力量被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传统人际网络和互联网能够很好地克服个体力量过于分散的问题,也有助于降低以组织化形式对抗政府,导致冲突失控的风险。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微博、博客、网站、QQ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分隔各地的非户籍考生家长、律师从业者通过网络互通信息、协调行动、争取舆论话语权,借助数量庞大的网民使线上抗争与线下维权遥相呼应,使各种力量博弈以最快的速度呈现在公众面前。与此同时,政府也努力通过信息传播机制塑造公众形象、加强与公民行动主体的互动,争取工作主动,有效的信息传播为其提供了一个度量社情民意的晴雨表,降低了因不真实信息导致错误预判的概率——这就有利于在“抗争—参与”行动主体与政府之间形成“知己知彼”对弈态势,使双方能够更好地控制节奏,为抗争和参与的交融提供了有利条件。

3. 平和巩固阶段——缓冲稳定机制

“抗争—参与”行动要保持抗争不失控,并最终通过吸纳抗争、畅通参与的方式平稳落地,必须有一套使民众保持理性、政府保持克制的缓冲机制。这种机制对于公民行动主体和政府有着不同的实现方式。

公民行动主体方面,主要通过创新“抗争—参与”行动的剧目、台本来控制抗争的烈度。“抗争—参与”行动源于对政府维护公民权利情况的不满,它必然采取一些抗争的手段。但这种抗争不能被政府视为莫大威胁而予以强力压制,因此“抗争—参与”行动主体必须准确拿捏抗争的力度。创新“抗争—参与”行动的剧目、台本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如在厦门PX事件中,厦门市民对传统的示

威游行方式进行变通,创造了著名的“散步”抗争方式,“温柔而不失力度”地表达了不满。在刑辩律师维权行动案例中,抗争主体创造性地采用了律师团的维权方式,巧妙回避了“一名被告人委托辩护人不得超过两人”的法律规定,通过发挥集体力量大大提高了抗争力度,也有效规避了地方政府打压个体律师或者个体律师“剑走偏锋”而使事态失控的潜在风险。

在政府方面,合法性约束是缓冲机制的主要作用方式。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当公民以此为依据对政府决策的合法性进行质疑时就直接构成了对政府的政治压力,促使政府做出与其意识形态宣示一致的行动。案例一中,非户籍公民从争取放开异地高考这一单一诉求逐步扩散到对户籍制度、机会公平、人权保障等更高诉求上,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道义压力,促使政府不得不谨慎对待其诉求。与此相类似,案例二中,律师团也将北海律师被拘上升为公检法机关对律师权利的压制和对法治精神的违背,赋予其行动更深层次的含义,给相关部门造成了更大的合法性压力,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强力反弹的冲动。当前,政治稳定的意义依然受到强调和重视,为此,政府存在适度向公民行动妥协的意愿和动力。因此,与很多研究结论不同,我们认为,强大的维稳压力并不必然导致政府倾向于使用暴力压制公民行动,反倒可以使民众在非政治化议题中通过适度抗争成功地让政府作出妥协。

四、结 语

现代政治学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对公民行动的研究非常重视,公民行动的勃兴被视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个体希望在公共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公民行动的需求日益增长,与相对缓慢的正式制度变迁形成了一定的落差。于是,如何

在合适的政治空间实行公民诉求的有效表达就显得日益紧迫和重要。西方先发国家的经验提示我们稳步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是首选,但亚非拉的政治发展实践却显示了社会抗争的巨大能量,对此,中国应该做出何种选择?

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激荡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存在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与社会抗争的合理性有机结合的“第三条”公民行动水平提升之路呢?带着这样一种理论愿景,从当下中国公民行动的丰富实践出发,我们提出“抗争—参与”这一新的视角,从抗争性参与和参与式抗争两个方面勾画出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已渐次呈现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理论推演中,而是源于对现实的审慎反思:一方面是伴随改革进入深水区而积聚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民众日渐增长的权利意识、参与意愿;另一方面是执政党对民众诉求的高度关切和对政治稳定的不懈追求以及高能力、高效率的官僚机器,使得社会抗争和政治参与在沿着不同的轨道推进后,却又在理性与妥协中慢慢融合,形成了“抗争—参与”这一特定的公民行动模式。

抗争中有参与,参与中有抗争,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的公民与政府互动模式,一方面,要求公权力放弃保守的管治心态和患得患失的“刚性维稳”思维,给予公众表达不同意见的充分空间和自由,对事关公民权利的各项公民行动从制度上予以规范化,使公民行动尽量常态、可控、有效;另一方面,要求加强公民教育,培养理性、包容、开放的公民文化,引导公民参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使公民行动成为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不断提高国家治理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的重要助推力。(本文是在导师王金红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是王金红教授带领弟子开展社会抗争与公民行动系列研究的相关成果。王金红教授对本文的写作框架和具体观点都提供了宝贵意见,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责任编辑:于尚艳】

The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n Chinese Social Contention in Internet Era——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Wukan Event”

(by WANG Jin-hong , LIN hai-bi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 ,contentious actors have diversified ,including direct participants ,witnesses and out-of-field interveners. Out-of-field interveners have not ye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Wukan Event” ,we found that the out-of-field interveners are not passive bystanders ,but ones wit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 participants. Out-of-field interveners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ntentious events. They attained that mainly by gaining more say with the help of the multipl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and then having an influence on the appeal and issues of present social contention ,expanding the contentious space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mensions. For these ,out-of-field interveners can play a role on shaping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indirectly ,avoiding excesses ,balancing power between the different people on present conten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is a new trend in the current social contention of China ,and also a new perspective that is indispensable for research of contention.

Key words: out-of-field intervention; out-of-field interveners; social contention; contentious repertoires

The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Civil Action

(by DAI Lin-l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limitation of two major approaches to civil action research ,then asserts that we should try to understand the feature that is demonstrated by the blend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civil actions in present China.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may be called “contention-participation”. This new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es two models: contentious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nt contention. It demonstrates the causal mechanism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contention-participation” actions by analyzing two typical cases. On the basis of that ,we suggest that we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civil action by making further mixing of social conten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contention-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ntentious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 contention; civil actio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QIN Hui-yin , Fu Mei)

Abstrac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distinctive form and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 Why the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adopted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due to many aspects of inevitability and rationalit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it has co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It is the need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 unique form of Chinese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realistic choice and effective way of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n China.

Key words: socialist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cessity; rationality.

A Study on th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UA Market and CER Market

(by LIU Ji-xian , XIE Sai-sai)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 EVA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CER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symmetrical spillover effects. This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tested by Granger causality test , VAR model ,MGARCH-BEKK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fused. It exerts dissymmetric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the EUA market and the CER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income spillover ,the EUA market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R market ,however the CER market has no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EUA market. On the aspect of volatility spillover ,there is a two-way negative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EUA and CER markets. But the EUA market has a stronger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ER marke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 why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is rejected by empirical results and proposes some advice to our government.

Key words: carbon trading market; spillover effect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VAR Model; MGARCH-BEKK Model.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bor Policy Comparison

(by HUANG Yan , DING Xiao)

Abstract: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are facing fierce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protection model has been challenged harshly.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different natur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labor protection ,labor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movemen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of workers’ rights protec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ore and more complex participation subjects.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for solving labor relations by the government ,trade unions ,and workers was broken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consumer movemen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media have been involved.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labor relations ,summarizing the challenge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national legislation and rights protection of trade unions brought about by path diversification of workers’ right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labor policy;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daptation Capabilities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Reciprocal Determinism”

(by ZHANG Jing , WANG Jin-yun)

Abstrac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aces adaptation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clud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Based on Bandura’s Reciprocal Determinism theory ,the present study shows “four-level ” training mechanism: (I)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